

如何對待大學生的迷茫與困惑

近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江西農業大學一名大三學生的讀者來信,這位同學在信中坦誠地訴說了他目前的迷茫和焦慮:他曾經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但忙忙碌碌之後又覺得失去了自我;他不愿意被動地為了就業去加入考證大軍,但又常常擔心將來找不到工作;他想按自己的意願簡單生活,可又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走,找不到奮鬥目標。

相信這種焦慮和迷茫在當今的大學生中有一定的普遍性。因為一方面,大學時代正是年輕人的世界觀、人生意義的形成時期,難免會有“少年維特之煩惱”;而另一方面,如今大學生所處的外部環境,比如正在改革中的大學教育和

正在加大的就業壓力,自然會使身處其中的大學生產生迷茫與困惑。

因此,大學生的迷茫與困惑已經不僅僅是校園內的問題,而應該是一個值得社會來關注和重視的問題。首先,是如何讓大學生正確認識自己了解自已,讓他們對何謂“成才”、何謂“成功”有明確、全面的,而非片面、功利的理解與認識;其次,是讓大學生正確認識社會,只有全面的了解社會、了解這個時代,他們才能在社會中找准自己的角色與發展目標;而最主要的,是社會應該為青年人的健康成長與發展營造更為良好、和諧的社會環境。

公選校長：主人翁為何“漠不關心”

■本報記者 陳彬

“對不起,我是女生,不太關心這事。可能男生會更關心一些吧,你問問他們。”電話那頭的聲音很有禮貌,但語氣中也略顯尷尬。

說這話的是東北師範大學的一名學生,她剛剛拒絕了記者提出的和她切身的切身利益其實有莫大關係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你們學校正在公選校長,這件事情你清楚嗎?

公選?你信?

公選校長的事情發生在2011年末。教育部在其官網上宣布面向全球選拔東北師範大學和西南財經大學兩校校長,並採取自願報名加面試的方式,首次允許兩校教師幹部代表和學生代表加入選拔過程中。

此舉一出,立即在國內引起廣泛關注。公選校長的方式也被稱為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探索。很顯然,這一政策的一大關鍵環節便是將普通教師和學生吸納到選拔校長的过程中,發揮其主人翁的作用。

然而,如今教育部已經公布了後選人名單,距離1月中旬對候選人進行面試已經時日不多,這些首次被賦予權力的學生們,對此事又是如何看待呢?

就此,記者通過校園BBS等渠道,聯系了十餘位兩校學生,這一“樣本量”雖然不大,但也能基本反映學生的一些態度。在採訪中記者發現,對於這件外界已經普遍關注的大事,他們的態度可以用“漠然”來形容。

在這些學生中,幾乎所有人都聽說過公選校長一事,但僅僅限於“聽說”,大多數學生都表示,聽老師談到過有這樣一件事。對於稍顯細節的問題,如候選人的條件、候選人需要什麼樣的競選流程、面試的時間、自身可以行使什麼權力,所有學生均不知曉。而這些問題,其實只要稍微關注一下教育部的通知,都不難找到答案。

除此之外,記者也留意了兩校的网络論壇和貼吧,對於選拔校長一事,學生們的討論也非常少。在西南財經大學的百度貼吧中,曾有學生全文轉載了教育部的相關文件,但在近兩周的時間內,該貼的回復數為零。

即使在网络上不多的回應中,學生們更多表現出的也是一種不信任的情緒。如在相關新聞的評論中,一位學生僅僅留下了四個字:公選?你信?

與之可以形成對比的是,2011年國內某媒體曾刊登了一篇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周保松回校該校原校長、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的文章。文章中有一細節:1995年,高錕宣佈退休後,該校學生會曾專門舉辦一次論壇,讓學生有權參與選拔新校長。高錕携几位校領導親自參加了論壇。

2011年末,教育部宣布面向全球選拔東北師範大學和西南財經大學兩校校長,並首次允許教師幹部代表和學生代表加入選拔過程中。

公選校長的方式也被稱為高校去行政化的重要探索。然而,這些首次被賦予權力的學生們,他們的態度可以用“漠然”來形容。

專家認為,改革的方向是對的,但這一步邁得究竟會有多大,只能拭目以待。

同為選拔校長,為何學生的參與熱情相差如此懸殊?

定位有誤還是觀念問題

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別敦榮看來,老師的態度與學生應該不會有太大差別。

目前看來,對於公選校長所體現出的進步性,人們是幾乎沒有異議的。採訪中,別敦榮也對此表示了讚賞。但他同時強調,當一項政策被實施者大張旗鼓地加以推進時,與其利益攸關方却缺乏參與的主动性,實施者便不能不反思推進過程中的某些失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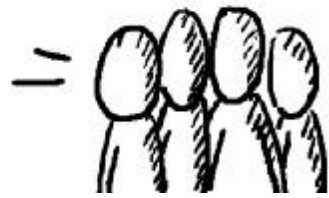
“之前相關部門對校長的任命制完全是封閉的,師生對外很少有機會民主化參與。此次改革應該說是開了一條‘縫’,可以允許一些人參與進去。但就目前的狀況而言,其開放程度依然不大,很難引起人們真正的參與熱情。”別敦榮說。

對此,他解釋道,從此次公選校長的程序上看,其校長的任免權依然是上級組織部門手中,雖然在過程上添加了“在教師幹部代表和學生代表中進行民意測驗”的環節,但其並沒有具體說明民意測驗結果在多大程度上會對最終校長的選出產生實質性作用。

“這其實是一個定位的問題。”別敦榮說,大學既然是法人,其領導地位就應由法人自己決定,否則學校自身的法人地位就不存在了。而當任免決定權依然沒有下放到學校時,無論是



誰當校長並不重要, 呵我們的專業大學 有所幫助才是最重要的。



董怡辰制圖

老師還是學生,都不會對公選的意義抱有過高的期望幻想,更無從談及積極性了。

然而,對於別敦榮的意見,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北京大學教務部副部長、元培學院副院長盧曉東表示,公選校長對於國內高等教育而言,還屬於新鮮事物,一般的學生和老師接受還需要一定的過程。“學生們按照傳統觀念,覺得自己依然是處於‘被代表’的位置,因此當權力真正到來時,不知道該如何運用。”他說,在制度的轉化過程中,學生的思維沒有跟上變化,有這樣的“落差”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需要採取一定方式,促使學生轉變觀念,提高學生的權利意識。

“中國的教育問題錯綜複雜,覆蓋面非常廣,因此改革也需要小步慢行。在‘公選校長’一事上,相關部門的步子已經邁得足夠大,我們需要多一份耐心。”盧曉東說。

“委派還是選舉,這很重要”

2011年9月,作為復旦大學去行政化的重要內容,該校領導全部退出學術委員會,委員會舉行了一次真正民主的選舉。是時,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曾專門發文,提醒選舉者要認真對待手中的權利,如果還是認為選舉在“走過場”,自己也敷衍了事的話,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就有可能變得形式化。

“這件事與‘公選校長’相比,有很多相似之處,這樣的提醒也同樣有效。”熊丙奇說。

在熊丙奇看來,目前學生對權利漠不關心的形成原因無非有二:其一,學生們長期受思維慣性限制,覺得此事與自己無關,而學校也沒有做好相關的引導工作;其二,很多人目前還處於一種觀望的狀態,對於改革是否真的“動真格”還存在疑慮,其造成的結果便是參與積極性差。相關部門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打消人們的疑慮。而要做到這點,首先要

不同聲音：學生參選意義不大

對於學生對公選的積極性不高的現狀,如果說以上專家認為或多或少還反映出一些問題的話,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唐安國則坦言,這一現象並沒有什麼不正常。

“學生的關注點和學校的關注點並沒有吻合度。”唐安國說,學生的目標比較近,尤其是馬上要畢業的學生,他們更關心的是新校長到任後會給他們的就業帶來什麼好處,以及畢業後是否會因為學校知名度的上升而獲得好處。對於學校未來的發展他們則並不怎麼關心。因此,只有當知名度的校長選定,並頒布了明確的施政綱領後,學生們的热情才會被點燃。

考慮的便是如何提高公選的透明度。

事實上,此次公選校長在國內並非首次。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同濟大學就曾通過公選任命吳自迪為校長,而且當時採取的是當場投票的方式。此次公選與上次相比,在透明度上明顯有所不及。

熊丙奇認為:“公選校長無疑是一種進步,但能不能起到好的效果,還決定於公選委員會的組成過程和組成結構是否透明合理,如果依然是行政官員為主導,其改革意義就大打折扣;另外,還要公開民意測驗結果。從目前來看,這兩點似乎都不盡如人意。”

根據教育部公告的內容,候選人面試結束後,教育部黨組會討論決定擬任人選並進行公示。如未發現影響任用問題,則辦理任職手續並公布公選結果。其間也並沒有公布測驗結果一環。

除去校級層面的不透明外,在學校內部,似乎透明度同樣不高。

依照教育部的公告內容,老師代表和學生代表對候選人的民意測評將在1月中旬,候選人面試結束後舉行。而當記者向學生詢問代表選舉情況時,幾乎所有的學生都表示對此事一無所知,而當時距離有些學生放假只剩一兩天的時間,幾乎沒有選舉的時間了。

“這其實並不奇怪,因為在之前高校公選副校長時,學生代表常常就是委派學生會主席和幹部擔任,這一次只不過是沿襲老路而已。”熊丙奇說,“我們有大學理事會、學術委員會的概念,但問題是這些人怎麼產生的?”在世界一流大學里,這些成員是選舉產生的,我們則是委派產生,這很不一樣,因為它事關整個公選過程能否名副其實。顯然在這方面,我們還需要做很多工作。

“毫無疑問,改革的方向是對的,但這一步邁得究竟會有多大,我們只能拭目以待。”熊丙奇說。

然而,等到新校長人選確定,學生們的參選權還有什麼意義呢?

對此,唐安國表示,學生參選的意義本就不大。換句話說,學生參選的象徵意義要遠大於實際意義。遴選委員會應該是由專家組成的,校長能否選取也主要是由專家甄別。學生,尤其是本科生由於本身閱歷太淺,對於校長能力幾乎沒有判斷力,因此也不應該有什麼發言權。

“在這件事上,學生們肯定不会反對,但基本上都不會有很熱情,我認為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只有當新校長的這些措施對他們的畢業升學有所幫助時,他們才會產生熱情,現在還遠不是時候。”唐安國說。

大學書記首開微博課堂

■本報記者 向向偉
通訊員 張東

范昕倩:“蔣老師能否談談校園文化與學生人文素養間的關係?”

彭超凡:“蔣教授您好!請問一名理工科學生有必要將很多時間花在提高自己的人文素養上嗎?”

近日,一場不一樣的“講座”在微博上吸引了眾多粉絲的強烈關注,浙江工商大學黨委書記蔣承勇首開“微講座”講授“人文素養與大學生綜合素質培養”。

蔣承勇在開始便點出“人文素養與大學生綜合素質培養”的話題涉及面寬,且理論與實踐中說法不一,無法給出統一正確的結論,這次是想通過微博上的討論引起“教”與“學”及社會對大學生成長的關注。

短短的一個半小時,蔣承勇與聽眾分享了对專業知識與綜合素質培養、讀書習慣與民族文化精神、“專業崇拜”偏向與通識教育問題的看法,分析了人文知識、人文素養、人文精神三者的區別,吸引了1200余人的熱情參與,至講座結束,轉播評論達4000余人次。

有同學問,人文素養何用?蔣承勇答:人文素養通常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知識與技能,而是其背後的精神與靈魂;它讓你明白生活意義,使你思考和追尋你所做的具體事務之價值,使你成為有自我意識、自我反省能力和有信仰的人。

網友馮一泰提到:“大學教育之目的,絕不僅是造就多少專家如工程師、醫生之類,而尤在乎養成公忠堅毅、能擔當大任、主持風氣、轉移國運的領導人才。(竺可桢)”蔣承勇認為:大學不只是儲存

知識的倉庫,而且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搖籃;大學教師的教育不只是一桶水灌滿一碗水,更是點燃學生探索真理和尋找生命意義的激情之火;大學不是停留於培養實用的專業專才,而應培養人格完滿的“人”,大學教育要引導人性漸趨於完善,提升精神點燃靈魂之火。

網友浙农林大倪建均提到:“專業崇拜”也是社會的急功近利在學生專業學習上的折射。蔣承勇表示:“社會需要的是大學生系統分析能力。不管什麼工作,我們所面對的問題都是紛繁複雜且瞬息萬變的,如果沒有系統分析、獨立思考能力,就算把所有的書吞進肚子,就算大學期間每次期末考試都得名,也絕對不可能在工作中脫穎而出。”

網友謝晶-里格-zjnu說:大學學習無疑要兼顧就業需要的知識技能和長遠競爭力、創造力、可持續發展潛力等綜合素質培養。蔣承勇認為:從遠大志向而言,上大學不只为養家糊口,更是為自我價值的實現以及對社會的貢獻可能會更大,其實從長遠看是生存能力更強。綜合素質優良的人多了,民族的創新能力就強了。

熱鬧的場面 and 豐富的話題不僅讓聽眾們受益匪淺,還吸引了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蔡奇和浙江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堅的“圍觀”。蔡奇認為,蔣承勇圍繞“大學生綜合素質培養”的講解深入淺出,循循善誘,非常透徹。他還指出:當今高校應當克服“專業崇拜”偏向,加強人文素養教育。學生既要掌握知識(包括技能),又要學會做人,養成健康情懷,還要有批判性思維。胡堅也表示,懂懂技術是機器人,裝上靈魂才是完全的人。人文讓你充滿活力與創造力。

雖然還有很多問題沒能得到及時回應,但“微講座”的形式還是得到了眾多粉絲的肯定。網友孫炎鵬的一句話或許代表了眾多參與者的心聲:期待下次再會哦,辛苦了,蔣教授!

中國大學評論

現代大學制度與學術生態系統平衡

■郭德紅

學術研究的生命力在於創新。學術創新需要平衡的學術生態系統提供良好的學術研究環境。平衡的學術生態系統的主要標誌是:公平、公正的學術競爭環境;思想自由、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的學術理念;鼓勵學術創新、積極探索真理的健康學術氛圍。而現代大學制度的基本職能在於保障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保持學術生態系統平衡,確保創新生命力常青。

現代大學制度是指以大學章程為核心的治理大學的制度體系。在西方國家大學中,現代大學制度似乎是一個不用探討的話題。這是因為,源於歐洲中世紀大學的現代西方大學,其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授治校、教授治學、教學自由和學習自由等大學核心理念在大學發展過程中基本沒有中斷過,並且深入人心,成為大學的烙印。而建立在大學核心理念基礎之上的大學制度經過長期建設和完美,已經成熟並且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為平衡和健康的學術生態系統提供了制度保障。反觀國內,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是未來一個時期我國大學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由此反映出我國大學目前的真實辦學理念和辦學價值與現代大學有很大差距,管理體制和制度體系不能使大學學術生態系統形成良性循環,不能滿足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對大學學術創新和培養創新型人才提出的新要求。

學術生態系統,是指由學術主體、學術客體以及軟硬件環境等元素構成的一個相互聯繫、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學術系統。生態學認為,一個健康和平衡的生態系統是穩定的和可持續的,能夠維持它的組織結構和自治,也應該維持對變化的恢復力。健康的生態系統能夠維持它們複雜性的同時能滿足人類的需求。同理,學術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持續性和自治性,及其自身對國家和社會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可以作為學術生態系統是否健康的衡量標準。一個健康的學術生態系統,其產生的成果必然能夠滿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就我國大學學術研究來說,改革開放後至20世紀90年代初,是我國學術生態系統的恢復和步入正軌時期,學術研究整體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與提高。進入21世紀後,我國的科學研究工作取得長足進步。以自然科學為例,2006年,中國SCI論文數量躍居世界第二;2007年,中國EI論文數量列世界第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更是繁榮。但客觀地說,我國的整體學術研究水平還不夠高,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自然科學主要是跟蹤模仿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更多地是介紹國外有關研究成果,自身原創性和標誌性成果並不多見,在國際上更是缺少話語權。據有關研究報告顯示,我國發表的國際論文平均每篇被引用6.21次,而世界平均值為10.71次,我國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排在世界100名開外,與世界平均值還有不小的差距。

與我國學術研究進步同步,由於急劇變化的外部社會發展系統和研究者價值觀的多元化以及受個人利益影響,學界也出現了學術成果泡沫化,原創性成果缺乏,功利主義氛圍日漸濃厚、學術氛圍淡薄,學術交流意識淡化、深層次的學術交流弱化,學術爭鳴日漸消失,學術不端行為頻頻曝光等問題。學術生態系統失調的問題,究其根源,與我國大學實際的辦學理念和大學制度存在的問題有很大關係。學者曾雄軍曾指出,從大學外部來看,雖然經過改革與發展,大學與政府之間的權力界限日益明晰,但政府依然牢牢控制著高校發展乃至高校命脈的資源配置權。如政府人員手中掌握著大量的資金、資源配置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權,行政權力實際上在不斷膨脹和擴大,大學難以真正建立其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內在生命機制。從大學內部來說,有三點主要原因,一是管理者政績觀出現偏頗,以研究成果數量為榮;二是行政主導大學學術研究;三是大學制度建設滯後。

例如,大學學術委員會中的領導職位多由雙肩挑的教授擔任,造成了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交叉混合。而在目前,我國大學行政權力相對於學術權力往往占據優勢地位,致使普通教師學術權力行使

方面得不到有效保障,治學積極性受到很大影響,阻礙了學術民主和學術自由環境的建設。由於缺乏監督和制約機制,在大學二級學院的管理中,部分院長一人財權和人事權在握,往往會出現二級學院院長“一言堂”現象,看似正常的學術論爭,由於摻入了行政權力因素,就形成了不平等、不公平、不正常的學術生態,更遑論學術自由。

大學作為一個學術組織,有其自身組織特性、發展規律和管理方式,大學必須按照學術組織的特質進行管理。在我國高等教育目前發展階段,針對大學存在的問題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有重要意義。通過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可以逐步解決教育行政化這一影響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引導大學按照自身學術組織性質去發展和創新。這也是政府、社會和大學的共識。中國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和完美,其重點應放在通過制定大學章程,明確界定大學利益各方的權力邊界,確立大學自身辦學的客體地位,確立學術研究人員的主體地位。同時,建立權力實施監督制度,尤其要關注和重視制定落實大學章程的制度細則的建設和完美,如此才不至於制度制定出來之高閣現象的發生,保障學術生態系統具有自治的能力和保持對變化的恢復力,形成平衡的學術生態系統,促進學術創新。

在推進建立中國現代大學制度過程中,要特別注意避免和克服學術評價過度量化的傾向,遵循規律,引導學術生態良性循環,促進學術生態環境優化。學者鄒大光曾特別指出,在當今大學里盛行的绩效考核,給大學內部的多項活動打上了經濟活動的烙印,上一節課值多少分、帶一名研究生值多少分、在一刊物上发表一篇論文值多少分,最終再把这些分數換算成貨幣。此種做法能稱之為現代大學制度嗎?放眼世界上的大學,又有多少大學對教師的考核採取這種“原格”的做法?該做法顯然是與現代大學制度背道而馳的。